

大众体育——在不同体育体制间的机会和挑战

基储德·皮斯特¹著, 秦毅²译

(1.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 2.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过渡期, 英国的体育组织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与“现代”体育共同发展。体育的原则, 尤其是想要实现的目标、需要的设备和设施的标准化、与法规的一致性, 以及专门化、合理化和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机构的支持, 这些方面缺一不可。在过去10年, 很多国家的体育组织在其职责内积极开展大众体育。

体育组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组织大众体育, 在此, 我会提出两种不同模式, 它们在原则、基本原理、结构和文化等方面都不一样。我会详尽地描述丹麦的体育体制, 以它作为欧洲的体育模式。作为对比, 我会描绘在美国体育运动是怎么被组织的, 这样比较是为了说明在体育体制间及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 有组织体育运动的巨大可变性, 以及体育结构和文化的差异性。

1 美国的学校体育

18世纪早期, 校园里的孩子们不仅仅靠学习、喝酒和打架等度过课余时间, 橄榄球运动也是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因为在校园这一特殊环境里, 橄榄球运动的发展和传播, 一开始也和划船或棒球等其它游戏和运动一样, 均存在发展的可能性。最初, 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带着惊慌的情绪抵制、轻视这些体育运动项目, 认为是在浪费时间, 他们厌恶体育运动中的暴力和野蛮。但是很快体育运动变成了学校间相互竞争的一种重要武器, 这直接导致了大学开始雇佣教练员, 建立体育运动相关部门。用这种方法, 大学控制了体育运动, 使其成为一项课外活动。

随着学校体育在19世纪末的传播, 一种体育体制建立了, 这也是我不能理解的, 教育机构成了组织的基础机构(vgl. Hums & MacLean 2004)。时至今日, 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大学的好坏和一个足球队的成功有什么关系? 运动员怎样能将广泛的训练和奖学金的标准相结合? 更深远的问题是运动员没有达到入学分数, 他们又怎样被招募? 学校中体育的支配作用和运动员的社会犯罪问题等都是值得探讨的。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 为什么这种体制不但生存

下来, 还日益繁荣。原因显而易见, 地位、声望等对美国的教育机构非常重要, 这些教育机构依靠学生的学费和毕业校友的捐赠得以生存。其次, 人们确信在学校中, 体育运动具有重大的教育价值, 扮演重要角色。第三, 体育和体育竞争在校园里为规则的制定和庆祝各项活动的举行提供了很多机会。

19世纪开始, 体育运动主要由俱乐部组织。然而, 体育俱乐部, 或是像德裔美国人协会的那种“种族”俱乐部, 或是“地位”俱乐部, 这意味着在这些俱乐部中, 上层阶级是主要的消费阶层。因此, 体育俱乐部不是某一项体育运动的基础, 也不是所有体育组织的基础。

高校仍然是业余体育运动最重要的供应者, 是业余体育运动得以开展的关键。美国高校运动协会代表着1200多家大学和学院, 他们彼此间进行体育比赛, 也就是说, 他们在不同的体育项目、不同的标准间进行竞争。美国的学院和大学的体育运动和欧洲俱乐部开展的大众体育运动最为相似。

许多体育组织提供体育运动产品以及为不知名的运动员提供私人助理, 孩子这里是这里最主要的人群。地方的公园、社团俱乐部、收费的体育组织、教堂的团体都为大众提供运动计划, 也为体育比赛提供赞助。在地区联盟, 父母或者孩子们组织自己的队伍或俱乐部进行比赛。商业性的俱乐部对孩子们进行体育培训, 主要面向精英体育, 特别是体操、网球、滑冰等项目。

Little 棒球联盟和 POP WANNER 橄榄球致力于在孩子们中间普及棒球、垒球和橄榄球。另外, 还有青年篮球联赛和足球联赛也同时存在(在2003年, 大概有1750万孩子参与其中)。这种类型的体育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 孩子们运动的“职业化”, 过于强调取胜, 过于注重高水平的青少年运动员, 而把那些仅仅将身体锻炼视为自己需要的孩子们排斥在运动之外。另外, 在比较穷困的家庭中, 孩子们运动的主动性不高。更严重的是, 父母和孩子都梦想获得体育奖学金, 并以此为抱负和理想, 没有经过训练的父母就成为教练。高额的成本、训练缺乏持续性、一些项目计划资金的不确定等问题都是我们要面对的。

成年人群主要是在健身俱乐部进行身体活动。当前健身业非常红火,2005年在美国至少有23500家健身俱乐部,有3900万会员。健身业可以创造148亿美元的产值,并且前景依然非常广阔。青年人基督教协会也“出售”健康和健身。20世纪后期,青年人基督教协会削弱了其宗教使命。今天,2617个青年人基督教协会是美国最大的非赢利社团服务组织,尽管如此,其功能和赢利性的健康与健身俱乐部是一样的。另外,保龄球中心、网球中心、高尔夫课程等都可以为付费的健身者所享用。

2 丹麦的射击、体操和政治

在丹麦,体育活动的发展也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伴随着农民运动。这场运动有明确的方向,并且有左翼政党的支持,目的是为了改进教育。1861年与普鲁士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射击俱乐部的建立,射击俱乐部也就成了丹麦体育体制的根基之一。这些协会的目的是使年轻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1870年射击协会在其它体育活动中采用了体操训练方法。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在1907年女子被允许参加射击运动,并且从1918年开始成为协会的成员。

1864年丹麦反抗普鲁士的战争失败后,教育成了国家幸存的唯一手段和重建家园、表达丹麦统一的有力工具。这种教育类型,主要是针对农民,从1844年开始就由所谓的民间高等学校提供,它并没有具体的能力目标,仅仅为了“启示生活”。民间高等学校是第一个以瑞典体操为主要形式提供身体教育的机构,体操是丹麦体育体制中另一个根基,从1799年NACHTEGALL在哥本哈根创立体操馆开始,19世纪上半叶被引进到学校和军队中。之后,体操迅速传播开来,并且进入到民间高等学校。瑞典体操强调顺序和纪律,系统有效地训练人的全身,目的是锻炼身体的“行为”和年轻人的意志,并且通过相关的争论使其合法化。射击协会和瑞典体操协会主要为军事服务,以军事作为主要方向。民间高等学校和射击协会合并后,瑞典体操协会也变成民主政治的一个象征。在城市中,其他的体操类型,特别是不同种类的女子体操形式开始蔓延和繁荣。

从20世纪开始,射击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体操日益赢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和追捧,这就导致了一些分裂和融合。体操协会和射击协会的名称和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包括各种类型的民间体育形式。

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现代体育运动也在丹麦蔓延和流行开来。这些体育运动在城市中很受欢迎,很多比赛也都仿效英国的模式由俱乐部和联盟来组织举

行。1896年丹麦体育联盟作为一个保护组织成立了,它主要面向国际上的体育比赛,不与射击运动员和体操运动员一起倡导民族主义。

丹麦体育联盟的成立和现代体育的强大吸引力迫使射击运动员和体操运动员要分辨清楚他们和体育联盟的距离,重新定义他们的目的和计划的单一性问题。他们要抛弃为了竞技而参加体育运动的观念,反对训练过度,因为这样会造成身体和精神的日益衰弱。体育就应该是基于身体和精神和谐之上的为大众服务的体育。这应该归功于大众教育的普及,应该肯定大众教育的积极贡献。在不同的体育组织之间各种不同的运动实践变得越相似,也就越来越会强调意识形态的不同,特别是人们对竞技运动和大众运动的认识也不相同。

20世纪晚期,有很多丹麦人参加了一个或多个体育运动俱乐部,会员间的争斗和训练计划的重叠引起了一场各协会和俱乐部是否应该合并的讨论。丹麦体育联盟主动采取措施将合并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它建议大众体育协会加入他们的组织,然而这项提议直到今天也没有被通过,“大众体育”和体操组织却合并了。1992年,丹麦体操协会与体育协会强调丹麦的价值,将自己的行动定义为“草根运动”。与此同时,丹麦体育联盟也承办一系列较低水平的比赛,并参与一些休闲娱乐的体育运动,因此改变了它的结构。丹麦体育联盟当前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要不断地提升丹麦人群的体育运动参与程度。

在丹麦的体育体制中,分区进行是比较符合丹麦国内阶级间等级差别不大的事实的,这点和德国的情形有些相似。尽管丹麦的工人体育协会比较少,在社会体育运动中,也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差别。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事射击运动和体操运动,农民比较支持射击协会,较多参加瑞典体操,支持民间高等学校和大众体育,而多数保守的城市居民则比较拥护国际体育运动。尽管在国家中体操和大众体育比较繁荣,但是在城市中运动员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竞争和表现。

3 今天丹麦的大众体育

在丹麦,体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并不被重视,自从1976年开始体育就由文化部负责管理。从19世纪到今天,有很多不同的观念和法律都保证了对大众体育的财政补贴。体育设施的使用都是免费的,体育组织也会有财政的支持。另外,用于为孩子们和年轻人雇佣教师所花费的钱也是由政府提供的。丹麦政府为每个公民在大众体育上所付的支出是所有欧洲国家中

最多的。

尽管有强大的政府支持,体育组织的主要原则之一还是自治。丹麦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唯一一个存在三种主要体育组织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只有一种体育组织):丹麦体育联盟、丹麦体操与体育协会和公司体育联盟,公司体育联盟主要是在自己的办公地点或公司内部进行体育运动和身体活动。丹麦体操与体育协会也迎合“体育为了大众”的口号,开始聚焦各联盟的伙伴关系、公民的健康和教育。直到今天,丹麦的传统习惯和价值观还起着决定性作用。丹麦体操和体育协会提供很多诸如手球、游泳之类的活动,所组织的竞赛也仅仅局限在水平较低的层次。体操仍然在各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这也是丹麦47%的女性都是该组织会员的原因。

三种体育组织都是金字塔结构,并且都包括了俱乐部、地区的各种保护性组织,其中俱乐部是三种组织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建立在民主、团结、自愿和互惠的基础上。互惠原则是指自愿参加者为承诺所付出的代价会由其他参加者的承诺来补偿。一些家长很乐意在俱乐部中指导一些小孩子,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的孩子想在联盟中比赛,会受到特别的照顾和训练。

在丹麦,不同的背景下也存在非正式举行的体育运动,或者是由不同的机构和组织举办。个人公司已经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体育市场,不同的组织协会也开展面向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另外,非正式的团体也正在积极地使用自行车道、公园、海滩、街道等开展体育活动。尽管体育俱乐部的垄断现象已经消失,但是它们仍然是体育活动最重要的提供者。

我希望我可以向大家说明在19世纪,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是怎样影响体育的组织 and 举办的,在上述的两个国家中,传统观念都对体育体制和体育的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丹麦,体育运动随着国家倾向性的改变开始面向大众,尽管其中有很多次变革,可是它仍然在丹麦体操与体育协会中有很明显的表现。从19世纪开始,丹麦体育运动就具有了欧洲体育模式的特点,但是它并没有合并成一个组织。相反地,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的体育组织一个个地出现和存在。丹麦的体育组织很清楚地显示出欧洲的体育体制并不统一,但结构十分稳定;在社会领域中,体育经历了很多次的改革、争论、强烈的抗争、重新梳理。

美国的体育组织和体制结构同欧洲的体育模式很不相同。在美国的竞技体育领域中,体育就意味着竞争和表现,“体育为了全民”的观念是建立在大众参与

和重在参与的原则基础上的。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表演的重要性和取胜的欲望妨碍了非竞争性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在美国,没有一个保护性组织对各地区和各种类型的体育模式负责,但是存在着很多的机构、组织和公司:学校、学院、大学、社团、健康和健身俱乐部、青年人基督教协会和其他的商业性提供者。在美国,青少年的竞争性体育活动也是一个焦点。

4 美国的大众体育

接下来我会探讨不同体育体制对人们体育运动参与程度的影响和冲击。我也仅仅能聚焦到一些方面。尽管存在不同的问题和例子,但还是有足够的资料可以用来表示对比的深度。

在美国,青少年参与体育的程度非常高。一个调查显示62%的高中生从事正规的身体活动练习。一份2006年的报告指出大概有4100万的美国孩子参加竞争性的体育活动。这听起来是一条很振奋的消息;另一方面,青少年体育的职业化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很多孩子是为了得到大学的奖学金才从事身体训练,很多家长也给孩子施加压力让他们更加专业化,更加努力地训练。但另一个问题是:对于没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们又会发生什么?

国家健康中心的统计数字表明:有48%的孩子有精力从事体育活动和训练,但是只有24%的孩子1周会参加3次或者3次以上的体育活动。在美国最流行的体育活动是保龄球,大概有5500万美国人参与其中(超过美国人口的20%)。钓鱼和健身也非常受欢迎。健身俱乐部声称有3940万会员,占美国总人口的13%(包括婴儿和老人),然而,即使有这么多的会员,也并不意味着全部都会去健身。另外,青年人基督教协会在10000万个社区内为大约2220万人服务。因此,也就不会奇怪只有4%的美国成年人是地区的志愿者,响应着“体育、习惯、文化或艺术”这个口号。

5 当今丹麦体育运动的参与情况

在丹麦,7~15岁的孩子中,有88%参加体育锻炼,78%的孩子每周要用2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参加体育锻炼。

包含欧盟所有成员国在内的一份比较有代表性的调查,2006年被欧洲食品与健康委员会发布。该调查显示,丹麦是国民体育积极性较强的欧盟国家之一。该调查显示丹麦62%的成年人会参加体育活动。这个数字和丹麦本国的一组调查非常接近,该组调查显示,在丹麦,58%的人每周至少会参加1次体育活动,有

30%的人口每周至少参加3次或者更多次的体育活动。

根据2004年的调查,35%的丹麦年轻人,43%的男人和27%的女人是各种体育俱乐部的会员,这表明丹麦体育俱乐部的会员人数所占国家人数的比率在欧洲所有国家中是最高的。丹麦有500万人口,丹麦体育联盟有160万会员,其中女性会员占39%,丹麦体操与体育协会有130万会员,其中女性会员占47%,然而,同时在两个协会中都是会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根据约翰霍普金斯的调查,丹麦18%的人口,21%的男人、15%的女人都会自愿参加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和休闲活动。但是体育俱乐部不仅仅是体育活动的提供者,14%的丹麦人会经常去健身中心。

根据欧盟的调查,88%的丹麦人表示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创造机会参加体育活动,86%的丹麦人表示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有地区的体育俱乐部或体育活动提供商。关于体育机会的问题,丹麦在2006年是欧盟所有成员国中最好的三个之一。

通过对两个国家体育活动参加率粗略的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丹麦体育活动的参加率要高出美国很多,至少在成年人中是这样,而在年轻人中丹麦也基本上处于领先地位。

6 福利关系中的体育

跨文化比较需要理论观点,这种观点能为最后的解释和评价提供一个框架和标准。根据体育组织在社会不同部门(国家、市场、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里所享有的福利状态,体育组织能够被刻画和比较。各部门都有其具体的原则、规则、组织结构、行动和逻辑模式,此种情况下,ELVERS提出了三角关系作为各种关系的一个象征。培斯托弗和其他一些人采用“全民民主”的概念或者采用公民直接参与性质的全民社会概念,这种概念是个人社会服务下的产物,在三角关系中被置于公共的地位。

在丹麦,国家和市民社会紧密的合作关系能被很轻松地观察到。自从2000年起,丹麦政府就积极地响应自愿运动,这种运动对于建立、形成丹麦人的价值观和福利体制具有重要的和积极的作用。因此,市民社会运动过去得到政府的支持,现在也仍然会比市场得到更多的政治支持。

丹麦的体育具有较高程度,即使存在很多问题和争论,但它仍是以人们的主动性、自愿性和自我的组织作为基础。因此,有组织的体育运动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国家在财政上支持自治的俱乐部和联盟,希望它们可以为社会承担一些任务,解决

一些当前的问题以及对公共的福利做出应有的贡献。丹麦的福利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而这建立在通过税收进行财富的再次分配的基础上。体育和健康被视为一项福利和财产,应该是提供给全体国民享用的。

在相互的福利关系中,体育主要位于市民社会的福利体系,在国家的一些范围内以及在市场的很小范围内也有所体现。在体育系统中,市场是市民享有福利相对较小但增长迅速的一个单位。

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到:体育是非盈利部门中的一个特殊组织。体育属于服务性行业,是全体成员共同生产的产物,消费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产品分析家们认为它为市民参与者减少了成本,并为其提供了较高质量的服务和民主的机会。在丹麦,体育协会及其成员积极地分享和参与这种相互服务的成果,他们将其用于自己的消费。在体育协会中,共同的产品和自愿性是利他性和自我兴趣相结合的,这缩短了市场和非官办组织间的距离。

根据培斯托弗的观点,这是设计机构时的一个微妙问题,它能够提升公民的责任而不是将这些责任和权利抛弃。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将其作为所有公共问题的解决者,必须要设计一个复杂、多中心的问题解决秩序,这里面必须包括政府机构、个人市场和团体机构等。丹麦具有不同组织的体育体制似乎能够满足这种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

美国人不愿意更多地去依赖政府,因此其协会有很长久的传统,主要是因为它的特殊历史,也就是在政府成立前社会发展的那一段历史。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就说过“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依靠着协会”。在今天,也还像150年前一样,美国人更多的是参加非官方的协会。

霍普金斯的《非盈利计划》的资料显示:49%的美国人愿意把他们的时间贡献给非盈利的组织。根据上面的数据,这对于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来说似乎并不是真的,至少对于成年人的体育活动并不是真的。

在美国,体育活动由教育机构、个人的健康和健身中心提供,青少年的体育活动是由不同的非盈利组织提供,这些非盈利组织有时候也和学校进行竞争。因此,体育是市场的一部份,而并不太归属于市民社会。私人身体锻炼主要是针对特殊人群,也就是孩子和青年人。

我们应该将成年人的体育锻炼放置在福利三个体系中的哪一层次呢?有一点很明显的是,健康和健身俱乐部以及保龄球中心属于市场范围。因此他们应该是属于市场福利的层次。但是,学院和大学提供的体育活动和身体联系又应该属于什么福利呢?在公立的学

校和学院里，尽管政府很少干涉学生的课余活动，也应该将其置于公共福利部门。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的那样，学校和大学的体育计划目的也是扩大市场的机构。学院间的体育比赛也主要是为了盈利。我们可以将大学的体育活动放置于市场吗？或是私立的学院和大学？

美国非盈利机构投资较高水平的教育。很多学院和大学都是由教堂等非盈利机构修建的，因此是可以免税的。然而，这些学校和非官方的协会有本质差别，他们是以市场的原则和逻辑行使其功能的。高额的学费和校友的赞助带来大量收入，但这些收入只能用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而不能够分配给业主和股东。学校当然要支付雇员工资来维持正常的运行。霍普金斯的调查显示，教育部门主要属于第三产业部门，但现实是，学校和学院也扮演着商人的角色。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的教堂以及与体育相关的提供者情况也都类似。那么，我们可以将学校体育放置于市民社会的部门内吗？如果这样做会使丹麦和美国的体育体制重大的差别变得不明显。同样的条件：体育、学校、大学、非盈利，但是由不同的机构运作和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造成了两个国家体育体制的巨大差别。

爱佛斯在 2004 年提出了一个框架来分析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部门是混合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是由市场、国家和非正式的个人组成。根据这个观点，第三产业部门在社会中是以属于公共区域出现的：是一个中间的区域但不是一个轮廓清晰的部门。第三产业部门内的组织被认为是一个多价值的组织，它们的社会和政治作用与经济作用一样重要。

下面我要说明在非盈利领域内体育的提供者（大

学和青年人基督教协会等）作为中间的和混合的组织位于非盈利组织、市场和程度较低的政府部门的重合领域。国家的主要作用是控制竞技运动和体育。美国是所有国家里非盈利领域内公共支持标准最低的国家。在美国，体育运动没有被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一项任务或责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青少年中，他们更注重的是体育的竞争性和表现欲望。在美国提供体育并不是一件慷慨的行为或者是福利行为，除了对于青少年人群不得不提供体育外，进行体育活动都是要在市场领域内付钱消费的。

从丹麦的案例可以看出，体育制度位于社会责任当中，大众参与者都可以从中获得不同的利益。非官方的协会为不同的年龄团体和不同的目标团体提供体育运动的机会。会员可以有很多选择，并且能够共同合作影响计划或方案的实施。根据研究表明，非官方的体育协会鼓励人们长期从事体育活动并且提供一定的社会资金。自愿参加体育俱乐部的会员其资格可以一代代传递下去，这也就是一种社会继承。丹麦拥有这么多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归功于体育体制。另外，在很多体育组织间的竞争也迫使这些体育组织必须要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对他们的需要作出反应，提供高质量的健身计划。另一个问题是：性别、种族、参与者的社会等级都涉及到两种体制的冲击，但不在本论文关注的范围内。

（本文系第三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特邀嘉宾主题报告）

[编辑：黄子响]